

文史资料选编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第三十三辑

- 回忆长辛店留法预备班 何长工
给张学良做侍卫官的日子里 陈大章
抗战前后的《新民报》 陈铭德 邓季惺
陆徵祥致刘符诚书信选
解放初期改造旧戏院的历史回顾... 马彦祥
剧坛鸿爪录(一) 翁偶虹
京剧的主要演员、导演及其他 许姬传

北京出版社

文史资料选编

第三十三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北京出版社

文史资料选编

Wenshi Ziliao Xuanbian

第三十三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*
北京出版社出版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国防大学第一印刷厂印刷

*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9.375印张 216,000字
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
印数: 1-3,300

ISBN 7-200-00401-4/K·40

书号: 11071·523 定价: 2.15元

文史资料选编 第三十三辑 目 录

- 回忆长辛店留法预备班 何长工 (1)
-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 杭宝华 (7)
- 给张学良做侍卫官的日子里 陈大章 (16)
- 张申府教授在清华 孙敦恒 (29)
- 记献身祖国教育事业的张怀先生 孙金铭 (40)
- 怀念史学家吕振羽同志 宇 斧 (56)
- 抗战前后的《新民报》 陈铭德 邓季惺 (63)
- 平津报纸何以不登政整会成立新闻 季迺时 (74)
- 回族爱国报人丁宝臣 丁文舟 (76)
- 1905年留日学生罢课运动始末 张篁溪 遗稿 (80)
- 陆徵祥致刘符诚书信选 (132)

- 唐绍仪轶事 傅耕野(151)
- 回忆我的父亲白石老人 齐良迟(153)
- 记老舍与齐白石的一段交往 刃 锋(160)
- 斋堂川的义和团运动 包世轩(168)
- 忆先伯父毓贤 叶赫颜札·仪民(177)
- 载沣摄政 凌 冰(183)
- 解放初期改造旧戏院的历史回顾 马彦祥(224)
- 记解放初期的两期戏曲界讲习班 傅任秋(243)
- 剧坛鸿爪录(一) 翁偶虹(250)
- 京剧的主要演员、导演及其他 许姬传(261)
- 研究余叔岩艺术成就的一种方法 刘曾复(264)
- 漫谈昔日广和楼 王 敷(274)
- 熙春社和正乙祠 楚 生(292)

回忆长辛店留法预备班

何长工

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是1918年初成立的。当时叫高等法文专修馆长辛店分馆工业科。我在这个班学习一年多，毕业时还给一个文凭。我保存了很久，后来丢失了。

当时对留法预备班学员的要求，一要懂一些英文或法文；二要懂点工业。

留法预备班设在四个地方，一个设在北京原陆军大学的地方（旃檀寺），这个班里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；一个设在保定的育德中学，那里有十几部供同学实习用的机器；一个是我们这个长辛店班，设在长辛店铁路工厂；再有一个班设在河北蠡县布里村，这个地方是李石曾的家乡，这个班是李石曾办的，大都是河北人。

按照毛泽东同志的主张，我们长辛店班实行半工半读，半天到工厂劳动，接触工人，学技术，半天在班里上课学法文。这个班有十多个湖南人，原来是分配在保定班的，因为育德中学容纳不下，就分到长辛店来了。长辛店班学员来自好几个省，其中有山西大学的二十多人；有两个是从新疆来的，他们的祖先是左宗棠从湖南带到新疆去的；另外还有河北的、陕西的，共有一百多人。

1918年，正当湖南军阀混战，我们六个高中毕业生没法考大

学，想到南洋去谋生，于是凑点路费到了广州。但出国需要护照，我们其中有一人给广东省当时的负责人写了个报告，写的文笔很好，被当政者看中，就召见我们，问我们为什么到南洋去？为什么不到法国去勤工俭学？我们说为谋生路到哪去都可以。于是，他就给我们写了封信，介绍我们去北京找李石曾，并给我们一笔路费。我们来到北京，找到李石曾，他给我们找个尼姑庵暂住。以后我搬到湖南会馆，后又分配到长辛店。留法预备班开学时，蔡元培、李石曾、范源廉都讲了话。

毛泽东同志亲自组织领导了湖南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。记得我们来到北京以后，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，新民学会的蔡和森同志便给毛泽东同志写信，请他来北京解决问题。后来，毛泽东同志和李维汉、萧子升（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，和毛泽东是同学，后来到国民党政府做官去了）、萧子璋（萧子升的弟弟，即萧三同志）等二十多人就来到北京。毛泽东同志来了以后，很快解决了问题，预备班就开学了。

我们这个班住在长辛店火车站东面的一条胡同里（米家胡同），这家原是一个车马店。我们进去时，屋里还放着一些车马工具，经我们打扫整理，成了我们的宿舍。我们进厂劳动分在各车间，有个姓陶（陶善琮）的工人，是个麻子，当我们的钳工教员。上课是在厂子外边一座小楼里，楼上一个教室，楼下两个教室，共分三个班（机械、铸造、钳工）。每月伙食费三元，工厂给补贴，吃得不错，还常有结余。临毕业时工厂把结余的伙食费给每人做了一套衣服。

毛泽东同志很关心我们长辛店这个班，也很关心长辛店的铁路工人。他不断到长辛店来。我知道的就有两次。第一次是1918

年冬（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来北京是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4月28日）。毛泽东同志先到工厂调查了解情况，和厂方商量能否增加点预备班的学生，然后到我们的教室看了一下，晚上就住在我们宿舍里。他和我们坐在土炕上，问我们学习和生活的情况，还询问我们有什么困难。记得他特别问我们湖南人学法文会不会发卷舌头的“嘟噜”音，并教我们怎样发这个音。他让我们学点音韵学，学《康熙字典》上反切拼音。他是师范的，师范学生都懂音乐，会唱歌。他还用唱歌的音韵教我们怎样发卷舌音。

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要我们联络工人，注意工人运动，了解工人生活、工作情况，帮助启发工人的救国心。他还鼓励我们要坚定信心，只要千方百计地做好准备，就一定能够出国。

当时有些进步工人在长辛店大街娘娘庙里办了个夜校，我们几个预备班的学生轮流到夜校去讲课，每周两次或三次。除了教工人识字、算术、常识之外，也讲些爱国救国的道理。

我记得毛泽东同志第二次来长辛店，是他在送第一批出国学生去上海以前，那是1919年4月。他和前一次一样先到工厂里和工人攀谈，然后到我们宿舍，和我们纵谈天下大事，谈怎样唤起工人，学习苏俄，指出这是救中国的路。他的谈话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和鼓舞，我们都很佩服。

毛泽东同志1919年4月从北京去上海，然后回湖南，继续从事革命活动，主编出版影响很大的革命期刊《湘江评论》。1919年底，他为了搞“驱张”（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）运动第二次来北京（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），那时我已经出国了。我在长辛店学习期间，也有一段时间回湖南。可能是在我回湖南期间，也可能是我出国以后，毛泽东同志又来过长辛店。

我在长辛店学习时名字叫何坤，“何长工”这个名字是后来毛泽东同志给改的。这里还有段改名的故事：我从国外回来以后，在湖南搞革命活动，担任华南（洞庭湖西区的南县、华容）地委委员兼军工部长，是这个地区的农民赤卫军总指挥。我们镇压了二百多土豪劣绅。反动军阀许克祥去长沙搞了反革命的“马日事变”以后，白色恐怖笼罩湖南。这时毛泽东同志在武汉暂时代理湖南省委书记，觉得我的目标很大，让我改个名字。他说：“你在长辛店学过工，就叫何长工吧！”我的名字就是这样改的。

我们在长辛店留法预备班学习期间，爆发了划时代的五四运动。我们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，都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。5月4日那天早晨，我们长辛店预备班的学生和一些工人，有的骑毛驴，有的步行到天安门参加反帝爱国大会。会后分几路举行大示威游行：其中一路去打卖国贼曹汝霖，结果把陆宗舆打了一顿，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——赵家楼；还有一路去东交民巷，包围日本领事馆，我们参加的就是东交民巷一路。

“五四”以后，我们在长辛店和工人一起大搞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，组织“救国十人团”，广大工人坚决支持，积极参加。反动军警要抓我们，工人就起来保护我们，夜里还有人给我们放哨。我们去北京联络有暗号，对不上暗号就不行。后来，我们组织的“救国十人团”在长辛店工人群众支持和参加下，迅速扩大起来，成了学生和工人的联合组织。

我们在长辛店等地查抄日货，抵制日货，但不把日货烧掉。我们认为烧掉是个损失，何必烧它？把它处理使用，商人损失小，所以商人也拥护我们。

我们在工厂里搞爱国活动，遭到副厂长刘家骥的反对。我们初来时，刘家骥对我们还不错。在五四运动中，学生火烧的赵家楼，正是他岳丈曹汝霖的住宅。他便骂我们说：“你们这些小子，爱什么国呀！不好好读书，光会闹事，你们胆敢反对大总统，大石头你们搬得动吗？你们是劣马害群，我要开除你们！”我们听了非常气愤，于是组织一些学生和工人，去包围他的住宅，他得到消息就逃之夭夭了。我们到他住宅门口，因他家大门紧闭，我们打不开，就要放火烧他的房子。他老婆（曹汝霖的女儿）一个劲儿求饶，比利时工程师也出面调解，我们才罢休。

我们在长辛店还做过一些公益事业。从火车站往北原来没有马路，我们课余时间就组织起来去修马路。1919年那年，长辛店地区流行鼠疫，传染得很厉害，死的人很多。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抢救病人，用石灰帮老百姓消毒等，老百姓都欢迎我们这些学生。

我们在厂里向工人宣传反帝反军阀的道理。有一次大军阀吴佩孚到长辛店，进工厂参观，给工人和我们学生讲话。事后我们就画讽刺他的漫画，画他的八字小胡子，画的还满像，工人们看了哈哈笑。我们有时也打着红色三角旗到附近农村去宣传。

那时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也来长辛店参观，我们也联络他们。他们见我们勤工俭学，不但能挣点工资，还可以出国留洋，很羡慕我们。他们有的认识到，上军校出来当“丘八”（兵），不过是给军阀卖命，心里很难过，也想走我们的路。可是他们上军校都有保人，是打了铺保的，入进去就脱离不开，所以没有来成。

“六三”上海工人罢工的消息传到长辛店，我们也联络了一

些工人进行了罢工。罢工的范围、规模和时间，我记不清了。我们和一些工人到车站，阻止火车开动，火车是不通了，工厂也有些车间停了工。

五四运动之后，北京大学的邓中夏、张国焘、罗章龙、何孟雄等都到长辛店活动过，还有五四运动前夕由日本归来的一批留日学生，如鲁其昌（后改名鲁易，也赴法留学，1924年成立黄埔军校时，任军校政治部副主任）等，均来过长辛店，我们都有接触。

1919年末，我们这个预备班结业出国。路费是毛泽东同志向湖南在北京的两个元老熊希龄（曾任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）、范源廉（曾任内阁教育总长）交涉，把他们保存的湖南的粮余、盐余拨出来，从帝俄道胜银行取款，每人四百元（因俄国十月革命后，忙着打内战，存款未及处理）。

我们在上海候船准备出国期间，孙中山、陈独秀都给我们讲过话。和我们一起去的，还有长辛店两名工人（王丕基、李士芬），原籍也是湖南，刚到法国，因为烧煤气炉没关严，煤气中毒都牺牲了。

湖南留法预备班，从始至终是毛泽东同志组织的，我们走上革命的道路，是他指引的。他高瞻远瞩，在困难的时候总是鼓舞我们提高勇气，增强我们的信心。在预备班里，蔡和森、李富春、罗喜闻、萧子升都做过对外联络工作。许德珩也是留法预备班北京班的学生，在五四运动中也是积极分子。我们同船一起赴法留学，我还给他当翻译。

长辛店曾支持和培养了一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，后来又成为二七罢工的策源地。我们应当永铭不忘这段鲜红的历史。

1987年8月

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

杭宝华

我是长辛店的“二七”老工人，当年在劳动补习学校上过学，参加过工人俱乐部，也参加过二七大罢工。要讲二七大罢工，就得讲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，因为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的发源地。

1919年五四运动时，长辛店的铁路工人就成立过救国十人团联合会^①，把爱国活动搞得热火朝天。为了开展文化救国，在娘娘宫北殿办了民众识字班。五四运动高潮过后，工人骨干史文彬、陈励懋、陶善琮等，用捐款的办法，在长辛店大街北墙缝胡同路北第三院，办了一所夜班通俗学校，教员由他们自己担任，陈励懋教数学，史文彬和陶善琮教语文，都是义务职，每天晚上有三十多名工人来上学。后来因为捐款有限，房租太贵，经费有困难，就和娘娘宫北殿的工界国民学校管理人商量，借用他们的校舍，因为他们只白天用，晚上闲着，他们同意，就搬过去了。

这时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，由邓中夏、张国焘等带领也经常来长辛店宣传，借这个地方给工人讲演。他们也不断给工人带来一些进步的报刊和传单等，还帮助从北京给请来李实、张纯作为

^① 救国十人团联合会，“五四”时期的爱国团体。其名取意于“十人团结有力量”。当时长辛店有工界、商界、学界、女界等救国十人团。1919年6、7月间各界救国十人团成立联合会。

工人夜校的专职教员，学校的名称也一度改为“平民学校”，学员达到八十多名。

1920年10月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，李大钊同志正式派邓中夏、张国焘来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，他们几次同工人骨干商量办法，决定在原来工人夜校的基础上，筹办一所劳动补习学校，从北大捐了一百元钱做为开办费，其中李大钊同志捐了很多。

1920年12月19日，长辛店各界为了祝贺工头邓长荣捐款办工界国民学校有成绩，给邓挂匾。听说匾上“乐育英才”四个字，是张国焘请陈独秀给写的。邓长荣为了感谢大家，备办了丰盛的酒宴。邓中夏、张国焘、张太雷、杨人杞借参加宴会之机来长辛店召开劳动补习学校筹备会。为什么要借这个机会开筹备会呢？这是因为当时想借用工头邓长荣的势力，便于工作的开展。宴会后，召开了劳动补习学校筹备会，由工人骨干武明科报告劳动补习学校的筹备经过、今后的办法及预算案章程等事宜（简章及预算案附后）。张国焘也在会上讲了话，他论述了工人应当学习知识的必要性。决定补习学校于1921年1月1日开课。因为不收学费，职工子弟报名的人数，超过预定的名额很多，不得不推迟原定开课日期，采取考试和检查身体的办法暂时加以限制，以便稳步向前发展。11日，劳动补习学校在祠堂口胡同路南一号院开课。

这所学校采取工会的组织形式——委员会议制。分议事部和办事部，议事部做出决定，再交办事部去执行。

这所学校的教务是二部制，白天教工人子弟，学普通小学的课程；晚上教我们工人，学高小的课程。教员是专职和兼职相结合。当时专职教员叫常驻教员，先后有李实、张纯、贾祝年、

吴容沧、吴汝铭、卜世润（卜润舟）等。兼职教员很多，有王铮、王光祈、朱务善、何孟雄、陈为人、杨人杞等。他们一星期有来一次的，有来两次的。邓中夏同志也亲自讲课。

开始时，教员讲课没有书，都是教员自编讲义。在教授方法上也与一般的工人夜校不同，不光教授工人文化知识，同时还用深入浅出的方法，宣传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理论，使工人在提高文化知识的同时，还提高了阶级觉悟。有一次，教员在黑板上写上“工人”二字，讲解说：“工人最伟大，‘工’和‘人’这两字接在一起就是个‘天’字，工人顶天立地。”我们就问教员：“我们工人伟大为什么还受穷？”教员回答说：“你们想想，铁路是谁修的，火车是谁开的，机器是谁造的，不都是我们工人吗？工人不盖房谁也没有住的，工人不织布谁也没有穿的，世界上谁也离不开工人，难道不伟大吗？你们知道工人为什么受穷吗？”有一个工人说：“命苦呗。”教员说：“不是命苦，是因为有阶级、有剥削，工人盖了楼房别人住，织了绸缎别人穿，资本家的钱，都是我们从劳动人民身上刮去的，他们为什么能剥削呢？主要是他们有政权。要想不受压迫，不受剥削，就得团结起来，组织起来进行革命。”各位教员都在团结起来有力量方面下了很大功夫，用通俗易懂的方法，讲了很多生动的例子。有的教员拿一张白纸，两手撑着叫工人用手指去戳，一戳就破了；拿三张纸还叫工人用手指戳，又破了；拿一大叠子纸再叫工人戳，把手指都戳痛了，纸可一张也没有破。教员说：“这就是团结的力量、组织的力量。我们工人也一样，五人团结赛老虎，十人团结如条龙，百人团结像泰山，谁也搬不动，枪炮也没办法。”

也有的教员讲打虎的故事，说山上有只老虎，张牙舞爪，称

王称霸，断道吃人，谁也不敢惹它。后来有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联合起来，一下子就把它给擒着了，老虎再凶也架不住人多。

还有的教员讲外国寓言故事，说有个老头临死前叫儿子们折木棍的故事。每个儿子一根木棍，一折就断了，再叫他们把每人的一根木棍捆到一起，叫谁折也折不断了。通过反复讲，再加上学校还办了图书馆，订了很多进步的报刊，有《湘江评论》、《劳动周刊》、《工人周刊》、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新青年》等供工人阅读，使工人逐步懂得了团结起来有力量，组织工会，向帝国主义、封建军阀开展斗争，反抗压迫，为工人谋福利，改善生活待遇等革命道理。我们工人越听越爱听，越听脑袋就越开窍，白天到工厂里互相一传，来这里参加学习的工人也就越来越多。

工人的势力越发展越大，这就引起了交通系的注意。交通系是铁路上的一个派系，是以国务总理梁士诒、交通总长叶恭绰为首的，他们的势力很大，把持着铁路大权。当他们看到工人组织一天天扩大，唯恐以后对他们的统治不利，就暗地里指使一些工头职员，在离劳动补习学校不远的南边路东一个小老爷庙里，也开办了一所职工学校。那所学校可阔气了，学校的校舍、设备都是新的。屋里是崭新的桌凳，院里是整齐的信号、扬旗、路牌，学生用的书、本、笔、墨、纸、砚，也都是学校发给。他们一方面用强迫命令的方法要工人去上学，另一方面还采取了一些办法对工人进行拉拢，例如，对成绩好的搞了很多奖励，学习成绩最好的给钢表一块（怀表），优等的给新布一匹，中等的给大褂一件或《四书》一套，次的还给铜墨盒一个。他们花那么多的钱开

办那所学校就是为了拉拢工人，培植他们的势力，企图把我们劳动补习学校挤垮。

开始还真骗去了不少人，有五六百人去上学。后来，我们劳动补习学校的教员和工人骨干一研究，决定开展斗争，不能让它和我们唱对台戏。于是就派史文彬、陈励懋、王俊等工人骨干，也到那个学校去上学，借机会向在那里上学的工人做工作，说北边的学校好，老师和气，尽说我们工人心里话，让我们联合起来，组织工人团体，以后还要帮助我们开展斗争长工钱呢。通过做工作，一下就拉过一半人来，又过一段时间的斗争，那个职工学校就被我们斗垮了。

1921年5月1日，长辛店的铁路工人，在娘娘宫开了一个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大会。这次会声势很大，有一千多人参加，除本地的铁路工人外，还有北京、天津、保定等地派来的代表，报社的记者也闻讯而来。在这次大会上宣布了“恢复工会”（实际上是成立工会，因为，说成立工会，当时的统治阶级不允许，说“恢复工会”就可以不受干涉）。大会开得很热闹，还演出了文艺节目，会后还组织了大游行。每个工人手里拿着一面小旗，沿途喊着口号，散发了很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印的宣传品，有《五月一日劳工宣言》、《工人的胜利》等传单和《五月一日》的小册子。队伍由前街绕到后街，回到原处解散。这次大会，是五四运动后北方工人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会活动。这次大会后，各厂分头组织基层工会，有的用串联的方法发展会员，有的召开大会集体参加，有的用请工友吃西瓜谈心的方法先成立工会小组。工会成立后，也在劳动补习学校内办公。

这年7月，在工会领导下开展了两次小规模的经济斗争，先

是我们工务工人发起要求加薪的斗争，后是修车厂工人发起的反对工头谭继先克扣工人工资的斗争，这两次斗争都取得了胜利。

有一次工厂北公事房有个先生（职员）叫高紫章，因为听差的工人任和给他买早点不合口味，打了任和两个嘴巴。以前任和经常挨他的打，只好忍着；这次任和找到工会，把情况跟工会一说，工会经过研究，决定教训一下高紫章。第二天一下班，工会组织了一百多人，在大厂北门外小桥头等着，高紫章一出厂人们立刻就围上去了，有个工人问了他一句：“你为什么打任和？”还没容他说话，几个工人就先动起手来，照脸上给了他一个大嘴巴，打得他晃了几晃差点栽倒，接着又有人打了他几拳，踢了他几脚。高紫章很不经打，就这么几下他就趴在地下起不来了。这时有个抡大锤的工人，手上有力气，像抓小鸡子似的顺手一提，就把他扔到臭水沟里了，直到人们都走光了，他才悄悄地爬上岸回家了。第二天他告到工厂，厂里也没人敢管，算白打了。从此以后，职员谁也不敢再打骂工人了。通过这次斗争，使我们工人进一步看到了组织的力量。

但是，工会成立时，因有工头参加，委员中也有工头，工会内部常闹分歧，由于工头从中捣乱，会务不能正常进行，甚至形成停滞状态。

中国共产党成立后，北京党的组织首先在长辛店工人骨干中发展了一批工人党员，有史文彬、康景星、王俊、杨宝昆等，人数虽不多，但在以后的工人运动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。1921年10月，工会召集机务、工务、车务三处的工会代表，开了一次联席会，决定改工会为工人俱乐部，重新制定了章程，改选了委员，不要工头职员参加。改选后史文彬担任委员长。工会为什么改名